

邵德潤著快樂的尋求序

阮 毅 成

自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來，我國文學界進步得最多最快的，莫過於散文。以六十年來的散文寫作而言，則顯然地可以看出，不但寫作者人數大為增加，而且寫作的成果，也日益充實。我們回頭再看五四時代作家所寫的文章，總覺得鬆懈、拖沓，尤其字句不夠美化。我們再看現代的作品，其佈局、論點、造句、遣詞，真是進步得太多了！

一般人寫散文，不外敘事、說理、抒情、寫景。我國歷代的文學家固然寫得很好，而史學家的散文，却更令人欣賞。我少時讀春秋三傳、戰國策、史記、東萊博議等書，就認為篇篇皆是很好的散文。我曾刻意摹倣，寫過不少篇的史論。這對於我日後的寫作，曾發生很大的激勵作用。民國七年，我初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學，國文教師楊雪門（學洛）先生，是當時的著名桐城派古文家。他要我們讀姚姬傳及方苞的文章，并學他們的筆調，經常作文。九年，我轉入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，校長經子淵（亨頤）先生却禮聘了劉大白、沈仲九、陳望道、夏丏尊、朱自清諸位先生，到校中教國文。我初學語體作文，初用新式標點，初讀了五四以來的許多新文學的作品，思想與筆路遂大為解放。這幾位老師在當時，固為新文學的重鎮，後來且皆成為大學的名教授，

皆有傳世的著作。其時每週要寫五篇作文，各位教師批改至詳，我真是受益不淺。他們都是從文言文中蛻變出來的，對於舊文學的基礎原很深厚。所以，他們曾對我說：「白話文要寫得好，還是要先將文言文讀通。」我此後常寫散文，喜用排句，又愛用成語，不多用虛字，皆是得力於這幾位名家的教導。

民國四十三年三月，我忽在臺灣奉命任中央日報社社長。我知道我的前任，是因為社論常受到指責，以致辭職，所以我必須注意社論的撰述。我檢查以往的社論，有兩個缺點：第一是缺乏論點。第二是文中夾雜了過多的資料性的統計數字與法規條文。要補救這些，就必須增強主筆室與社論委員會的陣容，而邵德潤兄乃應我之聘，到報社擔任主筆。二十多年以來，他不但未離開崗位，并且還為大華晚報寫社論。又為中央日報與中華日報寫方塊。他從未放下他的筆，我對其敬業精神，一向很欽佩。

但是，社論與方塊固然皆可謂係散文，而其影響力却大有不同。我在中央日報任社長二年多，發表的社論將近九百篇。而報社於去年出版社論選集，在這九百篇的社論中，只錄存了一篇。我每回想到當年常與德潤兄，在辛廠編輯部中，午夜燈昏，徬徨繞室；或字斟句酌，一改再改，

而後才能完成一篇社論，其中的辛苦，真難盡述。却在二十多年之後，竟毫無留存的價值，不禁爽然若失。現在德潤兄却能將其所寫的方塊，選出了一百篇，出版單行本，可見有人愛讀，也可見值得流傳，真是使我高興。

德潤兄的這一百篇散文，皆寫於民國五十一年至民國六十八年之間。題材廣泛，內容淵博。我讀了之後，覺得其最可以使人深思力行者，乃係他的人生觀。也就是這本書的書名——快樂的尋求。尋求之道，則是在書中一再強調的淡泊與容忍。我是一個遇事樂觀的人，我無論講話或是寫文章，從沒有牢騷，也不知道悲觀消極。七十多年以來，要說我未曾遇到過逆境，事事皆能如意順手，那是違心之言。我之所以能逢凶化吉，履險如夷，皆得力於德潤兄在本書中所申論的淡泊與容忍。而這二者，却是孔孟、老莊、釋佛各家所共同期勉的。能淡泊就能時時自得其樂，能容忍也就事事不會不快樂。德潤兄以優美的散文，寫出人生的最高境界，確可以使人追求到內心的快樂，并且能與眾人同樂。這是如何偉大的胸懷，又是如何崇高的收穫？他要我為他寫一篇序，我又怎能不應命呢？

是為序。

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